



劉香成曾獲普立茲獎「現場新聞攝影獎」。



特朗普遇刺後一張現場照片「洗版」全球，拍攝者為美聯社駐華盛頓特區的首席攝影師Evan Vucci。不少人討論拍下這樣一張「經典照片」需要哪些條件，更有甚者將之視為下一屆普立茲獎的有力競爭者。

被稱為「中國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攝影師劉香成攜新書《決定性瞬間——劉香成 鏡頭·時代·人》在香港書展舉行講座「劉香成的決定性瞬間」。身為美聯社曾經的首席攝影記者，也曾獲得過普立茲

獎「現場新聞攝影獎」，劉香成記錄過很多重要的時代瞬間。人們在感嘆劉香成不獵奇、不美化、自然而平靜的鏡頭紀錄風格的同時，更驚訝他在世界歷史發展的脈絡裏，總是能來對了地點，來得正是時候，記錄下那些影響世界的瞬間。

這位新聞攝影界的「關鍵先生」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分享自己46年新聞攝影生涯的成功要素，並講述自己的「一帶一路」拍攝計劃。

大公報記者 管樂、徐小惠



掃一掃有片睇

最新作品集回顧46年攝影生涯「決定性瞬間」 劉香成：以紀實鏡頭定格時代經典

在香港書展的講座上，被問及如何看待今次Vucci的成功，劉香成的回答很簡單，「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攝影也是給有準備的人創造的。」

早前的專訪，約在劉香成位於跑馬地的家中，客廳是西式的現代風格，簡潔、明亮、實用。劉香成出生在香港，幼年生活於福州，10歲時回到香港，劉香成的父親劉季伯曾任《大公報》國際新聞編輯。劉香成至今還記得當時位於皇后大道中的大公報報館裏有一張乒乓球桌，「那個桌子就在他們辦公室後面，我經常去調皮。」

「（我父親）他們那一代人做新聞其實和今天沒有什麼區別。」劉香成說，「他們會很深入地去了解一個事情，會很仔細地聆聽一個人說話，這些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家庭耳濡目染的影響，令新聞的種子在他心裏埋下。後來他打算去美國唸書，「我印象很深，他的那些同事問我，你去學什麼，我說當然是學新聞。他說千萬別去學新聞，你去學什麼專業都可以，心理學、什麼學都可以，千萬不要去學新聞。」劉香成笑言，「所以我後來去學了國際政治。」

「媒體工作就是講故事」

在劉香成看來，新聞絕非空中樓閣，一張經典的新聞攝影圖片，背後往往來自於專業知識和職業經驗的不斷累積。「其實現在的新聞核心競爭力和五十年前沒有什麼區別。你是做（美國）法律新聞的人，你要對美國法律非常了解，要對法律意見、議題內容、爭論核心滾瓜爛熟，你做國防、外交、文化藝術新聞、宮內新聞，亦是如此，你要掌握非常豐富的知識結構，因為你一開口，受訪者就知道你是否專業了。」

記者能力 不該用KPI衡量

在數據至上的今天，劉香成卻認為，記者不應該是一個用KPI（關鍵績效指標）去衡量的職業。「你想想看，當初美聯社把我派到中國、印度，派到整個南亞、整個阿富汗，派到蘇聯，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的任務，都要我自己去發現。」劉香成說，做特派員工作的樂趣正是在此，「這幾個國家、地區都夠大吧？文化十分豐富，也有好多層次，等你去探究和發現。你要有好好奇心，如果你對好多事情沒有興趣的話，你也別去幹這種工作，也不會把這個幹得好。」

26歲進入美國媒體工作，從《時代雜誌》到美聯社（AP），劉香成在一個由白人精英構成的環境中，闖出自己的天地。「一個記者怎麼建立他的名聲？是需要通過他日常工作去建立自己的名聲。」出色的攝影能力，令劉香成的工作表現受到肯定，加之對中國、蘇聯等國家和地區的關心，以及在日常工作中表現出的思考，劉香成先後獲得了被派往中國、韓國、南亞以及蘇聯工作的機會。由是，他成為首批進入阿富汗、報道蘇聯撤軍阿富汗的外媒記者，然後又出现在了蘇聯解體的現場，憑藉對蘇聯解體瞬間的紀錄，劉香成與同事共同獲得1992年普立茲獎「現場新聞攝影獎」。



▲《決定性瞬間——劉香成 鏡頭·時代·人》，劉香成著，商務印書館。



▲劉香成於1981年在紫禁城內拍下手持可口可樂的男子。作者供圖



▲人民公園長椅上的青年情侶（1978年）。作者供圖



▲撒馬爾罕孔子學院的一名老師在教授中文。受訪者供圖

「攝影工作離不開（攝影）作者的思考能力。我們所說的準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準備，是長期對文化、社會的理解與興趣形成的。」劉香成回憶，在蘇聯解體的新聞現場，他將快門速度調慢到1/30，以此記錄戈爾巴喬夫宣布完蘇聯解體後、將演講稿隨手扔在桌上的瞬間，由此表達那一刻的視角，不是開始，不是結束，而是一種「流逝」。

在劉香成看來，媒體工作就是講故事，如何將故事講得讓所有人接受，則是記者能力的體現。上世紀八十年代，劉香成被派往中國，面對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浪潮，要如何記錄與講述？他提到，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曾叫自己參加過一個會議，「他告訴我，他們調查了1979年至1981年外國媒體的活動，發現西方發表的關於中國的照片有65%是由我拍攝的。」

用易懂語境呈現「一帶一路」

劉香成習慣進入到拍攝者之中，以他們的日常，捕捉時代的劇變。他拍攝的照片，既有國家領導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進行中的農村經濟改革，也有城市裏逐漸增多的巨幅商業廣告和現代化設施，某種程度上保存了中國那個年代的記憶。這次新書的封面，就是劉香成對中國改革開放

的經典側寫。照片是他在1980年於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拍下的，畫面中有三位時髦的年輕人，他們穿着軍綠色的服裝、戴着墨鏡，毫無閃躲地直面攝影師的鏡頭。劉香成說，這三個年輕人令他觀察到，現代時尚潮流開始影響中國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年輕人，他說：「在此時，這三個年輕人的出現以一種幽默的方式表明：無風也起浪。」

當前劉香成正在進行「一帶一路」相關項目，計劃分三年時間去四十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包括柬埔寨、泰國、老撾、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花三年的時間其實挺久的，也會很辛苦，但是我考慮這個事情已經五六年了。」在劉香成看來，「一帶一路」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計劃，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閱讀了大量關於「一帶一路」的資料後，劉香成發現過往中文媒體對於「一帶一路」的報道吃力也不討好，「我希望能夠用一種東西大家都聽得懂的語境去呈現這件事情。」

劉香成強調，在報道中一定要對等，要說接地氣的話，他表示這次自己依舊會深入到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中觀察。「我心中的『一帶一路』，除了基礎設施建設，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國人和中國的產品走出去，我覺得這件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基礎建設。這個過程當中會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而這些事情，我想才是大家真正想要知道的。」

余兒分享《九龍城寨》創作歷程

香港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自上映後，掀起觀影熱潮。日前，一眾「寨民」齊聚香港書展現場，聽電影原小說作者余兒以「九龍城寨：從小說到電影」為題，講述故事創作理念、人物關係，以及一部小說如何煉成一部電影等。

大公報記者 劉毅

《九龍城寨》這個IP涉及小說、漫畫、電影三個不同媒介，余兒對電影的參與較少，主要是小說與漫畫的創作，余兒認為小說的創作，如同一套90分鐘的電影，自己在創作小說時注重的是人物的心態，雖然是動作小說，但對動作部分的着墨並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九龍城寨》並非一個傳統的黑幫敘事，而是一個充滿了俠義精神的江湖世界。

龍捲風靈感源於張國榮

提及武俠設定，余兒笑言是受了武俠小說作家古龍的影響，故事背景看上去帶着強烈的「懷舊」氣息，但事實上，他覺得是在保留「俠義精神」的母題下加入黑幫新元素，「表面上是一部

黑幫小說，但它的內核是友情、熱血。」作者在創作一部小說時，有時候也會帶入自己，余兒也不例外，他表示《九龍城寨》系列三部曲《圍城》《終章》《龍頭》也對應了自己的人生階段，寫《圍城》時，故事主角陳洛軍一無所有，比較衝動，有一條清晰的成長線。而到了書寫《終章》時，自己也做了出版社的老闆，「突然有了一種沒有龍捲風看着我的感覺」，心態就好像故事中替龍捲風成為龍頭的信一，要認真謹慎做決定，不可以犯錯。

而至於前傳《龍頭》，余兒表示，自己一開始並沒有想着去寫前傳，只是因為龍捲風這個角色很重要，能夠扛下所有問題，推動其他角色成長，還擁有

很高的人氣，故而覺得龍捲風十分值得補充其故事，「我在寫完《終章》之後才下筆寫《龍頭》，寫得很小心，因為在龍捲風身上不能犯太多錯。」

提起龍捲風這個人物，余兒說，該人物原型參考的是張國榮，「龍捲風」的死也是另類的圓滿，也令城寨的新一代接棒，給予年輕人成長的機會，「如果龍捲風一直活着，年輕的一代就不會實現成長，因為萬事都由龍捲風幫他們擺平。」

支持故事二次創作

電影版中，龍捲風這個角色由古天樂扮演，余兒形容他成功演繹另一個版本的「龍捲風」。戲裏的龍捲風是城寨的守護者，戲外的古天樂是當代香港影



▲《九龍城寨之圍城》電影原小說作者余兒。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

壇的帶頭人，「古天樂做出了自己的演繹，很精彩。」

電影中龍捲風和陳占分別由古天樂和郭富城飾演，兩名角色曾是知己好友，後來由於幫派立場不同而反目成仇，余兒講述人物關係設計時表示，「我首先構思了雷震東這個奸角，當時設定他是一個獨大的幫會頭目，但我不能每次都雷震東對付龍捲風。我覺得他應該最後才出現，因此還要有另外一

個人和龍捲風作為對手，然而單純設計一個敵對角色不太精彩，所以我便以羅密歐與朱麗葉作為構思。」這種因陣容對立而被迫破滅的感情，增添了敘事的悲情色彩。從小說、漫畫，到成為一部大熱電影，余兒支持故事藍本的二次創作，「粉絲是因為喜歡這個故事，才自發去創作，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另一方面也是幫作品做了積極的宣傳，只要開心就好。」